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陈玉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新的重要论断立足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定方向、立纲领、点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中国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唱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主旋律,把追求真善美作为文艺的永恒价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让中国精神真正成为中国文艺的灵魂。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民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鞭挞的。这些要求,明确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支撑民族和国家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它呼应了人们对精神信仰的热烈关切,鲜明的亮出了我们民族在当代时代的精神底色,是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and 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提高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观念的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难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文艺在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人们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表达有诸多方式,包括理论的、宗教的和实践的等。文艺以艺术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通过塑造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具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所不具备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能够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给受众,使受众在艺术的享受中,在审美愉悦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熏陶。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传世之心”,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完美,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自觉抵制“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倾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创作生产中的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让人们在文化熏陶中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它本来就生动而具体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文艺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独特作用,关键是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通过艺术化的审美创造,使核心价值观升华为美,形象生动的体现地文艺创作之中。我们要克服当前有些主旋律、正能量量的文艺作品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必须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特表现方式,通过诗意的笔触、精彩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丰满的形象,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和空间,使得文艺题材领域的拓展、思想意蕴地表达、艺术形式的选择、审美风格的呈现,都变得更加开阔、自由、丰富和立体,文艺创作最需要讲究形象的生动感人,细节的鲜活灵动、情感的真实饱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艺创作中,需要把抽象的观念概念转化成具体丰富的文艺题材和内容,转化为生动活泼的故事、活灵活现的语言、丰满圆润的形象,要善于从社会生活汲取灵感,积极反映历史潮流、讴歌人间真情、塑造美好心灵。要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思想道德情感的契合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小故事阐发大道理,做到深入浅出、情理交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引导人们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激发每个人心底蕴藏的道德情感,最大限度唱响正气歌、传播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写出最动人的篇章。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写中华民族的卓越风采,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要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践,书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向前来。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本质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体现的是个人与祖国的相互依存关系,饱含着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它所尊崇的忠诚、责任、正义、勇气、奉献等诸多美德,以及以国家民族集体为重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是汇聚共识、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重要精神支柱,是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之源,聚集和引导着一代又一代民族英雄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奋发图强,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每当我们重温那些对自己生长的国家和民族怀有深切依恋之情、强烈报效之志的诗文字句和音乐旋律,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迸发,都会激励出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强大精神动力,每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炙热的感情,并将这种感情,灌注到自己的创作中。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怀有深情,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热情相拥,创作的作品才会寻找到力量之源、血脉之根,才能产生感动人心的力量。

爱国主义也是文艺创作常写常新的主题,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律动着时代的最强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国表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冲破封建束缚,勇敢投身革命,为国血洒沙场,保卫民族独立,勇毅投身革命,为国血洒沙场,保卫民族独立,当然是最激烈、最炙热的爱国主义。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也深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满腔热情投身祖国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无疑是那个时代爱国主义的主要基调。歌唱祖国大好河山,歌唱劳动者,歌唱重

获新生的喜悦,成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文艺作品的鲜明主题。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爱国主义有了更加广泛的内涵。如在改革发展中开拓探索,在人生逆境中竞争向上,在科技创新中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等,都聚焦在和平时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这些创作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众多道德先锋、时代楷模,他们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强烈责任感,他们积极向上,开拓进取,创造创新,他们的事迹就是当代文艺创作中最好的爱国主义题材,代表了我们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文艺传统,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续写爱国主义的精彩华章。

近些年来,文艺创作中爱国主义的主调是鲜明突出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良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等,不时在创作领域出现。对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曲解和颠覆,出现了歪曲历史、解构经典、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的现象。更有甚者,还用个人主义冲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这些不良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造成价值观消解、人心涣散、精神弱化,难以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步伐。我们要旗帜鲜明的纠正不良文艺倾向,抵制文化浊流,反对“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思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时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要大力扶持爱国主义题材的重点文艺创作,不断推出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倾吐家国情怀、颂扬爱国英雄、讴歌时代先锋,使爱国主义成为当代文艺的主基调。要正确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生动反映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海内外儿女心向祖国的历程,要拓展爱国主义题材的表现空间,大处着眼,小处见大,着力开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锤炼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当代愚公精神等,大写特写时代的风云人物、历史记录,使这些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奋斗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对于真的认识价值,对于善的道德追求,对于真的愉悦需要,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向往,也是构成文艺的基本价值所在。所谓真,就是客观实在性和固有规律性,就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内在联系。文艺的真,是指文艺要通过合乎艺术规律的方式,将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以及作家艺术家的真诚体验表现出来。文艺的真实性并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照搬和模仿,也不是生硬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判断,而是通过“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感悟,体现社会生活中科学和真理的力量。尽管它有对反映对象的夸张或变形,但仍具有鲜明的认识价值,并且构成其他价值的基础。所谓善,就是人的主观目的性和社会功利性,就是对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有利、有用、有益的属性和价值。文艺的善,是指文艺要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力量。所谓美,就是真和善的典型形象显现,就是将真和善的内容通过典型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情感愉悦的认知和教化的属性和价值。文艺的美,就是文艺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充分体现艺术的品质,通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具体体现为语言美、形象美、精神美、意境美、形式美等。文艺的美是现实美的升华,既有对人们情感愉悦、心境娱乐或生理快感的满足,也有对心理美感、精神境界、道德

情怀的提升,从而发挥文艺的美学价值和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实在性的真,是美的基础,社会功利性的善是美的前提,生动形象是美的特征,一定典型性是美的程度。真善美的统一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独特个性化与普通概括化的统一,可以概括自然美、社会美、人的美、艺术美等一切种类的美的本质和规律。在文艺作品中,真是文艺作品的生命之基,善是文艺作品的价值之本,美是文艺作品的力量之源。文艺的真善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接受中,尽管三者会有所侧重,但文艺价值的根基,始终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美的东西必然是趋向向善的,虚假和丑恶的东西很难称得上美。文艺创作如果机械地过分地、不经艺术处理地一味求真,就容易呆板没有灵性;如果教条地过分地脱离生活实际和接受可能的去一味求善,就会流于空洞地说教,缺乏感染力;如果单纯地片面地、不问其他价值因素地去一味求美,作品就容易变得苍白,流于形式,丧失精神。只有把真善美统一起来,才能被人们广泛接受。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心动,让人们的心灵接受洗礼,让人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就是要以形感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从而启迪人,教育人,鼓舞人,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美化和诗化,发现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江海湖泊、山川田园、花鸟虫鱼等形象所具有的美,发扬畅神、比德、益智、健体等作用,发现社会生活中勤劳诚实的劳动、忠贞纯洁的爱情、大公无私的品质、勇敢献身的精神等现象中所具有的美,发挥修身齐家治国惠民等作用。发现人们心灵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学识修养、胸怀气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美,发挥陶情、冶性、励志、笃行等作用。一般来说,科学是求真、求知的,道德是求善、主意的,艺术是求美、主情的,但是艺术与道德的联系更密切,艺术审美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艺术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境界。文艺的天性和天职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通过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全面观照,弘扬良知和道义,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古往今来,举凡能够被广泛接受和经久传颂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品表达了对真的洞见,对善的讴歌,对美的颂扬,使人们为之动容,为之动情动心,讴歌真善美与鞭笞假恶丑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艺学艺术是生活的审美再现,是非真美,善恶美丑,世界一切都可以为作家艺术家所摄取,成为创作的素材。但是在作家艺术家的内心深处,必然有崇尚真理、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风骨和硬度。文艺作品可以反映和表现假恶丑,但它的立场是求真扬善审美。假恶丑进入文艺作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作家艺术家要站在倡扬真善美的立场上,立足于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基础上,本着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目的,进行社会批判、道德批判、人性批判,而不能以展示阴暗丑恶去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在文艺作品中,假恶丑只有被作为真善美的征服物出现才能获得认同。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化生活丑为艺术美。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些与追求真善美相背离的现象,有些理论家渲染什么“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文艺创作热衷于表现“恶之花”,以恶为美,以丑为美,毫无节制地放大人的生理本能与原始冲动,描写丑恶的人性、阴暗的心理、病态的心理,极力渲染烦恼、仇恨和绝望,这种以恶相向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人心、局限于自我价值的过度膨胀,个人私欲的过度放纵,缺少理想和爱,难以符合人民的审美意愿,停留在粗鄙的境界之中,与艺术的美学追求南辕北辙。还有一些创作者以“审美无功利”为理由,标榜“纯文学”“纯学术”,片面追求艺术性,反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强调“去道德化”“去价值化”。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艺术,文艺终究要和价值判断、道德理念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似乎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和理想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要以社会主义文艺观、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生活现象之真,鲜活灵动之美,营造积极健康的精神环境和刚健有为的思想氛围。

世间对“文艺学”一词的误解可谓层出不穷,而且往往与“文艺青年”“文艺范儿”挂钩,普通读者常常以为“文艺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流行文化,以为学文艺学的学生都是小清新。结果当人们发现,文艺学的研究也板板正正,不免感到有些诧异。其实一般来说,“文艺学”只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文学学科内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当然,广义的文艺学也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一切文艺作品、现象,甚至文化活动。这么看来,其实“文艺学”严格来说,还只是关于文学的科学而已,那就是最初从俄语翻译过来时的名字“文学学”所表达的意思。然而比较几种语言中“文艺学”一词出现的历史,则可以发现更为复杂迂回的情况。

“文学”“文艺”这些概念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这无可置疑,但是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和“文艺学”则是非常晚近的产物,而且都与20世纪初翻译和学习西方科学理论的过程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对“文艺学”译名由来比较完整进行解释的是朱立元与其博士粟永清合写的《新中国60年文艺学演进轨迹》一文,但文中仅仅讨论了“文艺学”一词在日语和俄语中的起源,而没有谈到更早的德语起源。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称“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并没有将“文艺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提法。被认为第一个直接采用这种用法的是1935年冈崎惠惠的《日本文艺学》,实际上冈崎并不是东方第一个专门使用此名词的学者,他的老师劳芳矢一可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个专有名词。在1935年之前有多位学者都在使用这个名词,比如1929年石山彻郎的《文艺学概论》,1931年风卷景次郎的《日本文学学的发生》、高木市之助的《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等等。但冈崎无疑是将国文学正式带向文艺学的领军者,有人提出过“冈崎文艺学”的说法,他修正了老师的“国文学”而转向“文艺学”,正是看重科学的精神。劳贺和冈崎都是从德国文学学汲取理论资源,劳贺的研究更偏向于德国巴赫尔德以降的语文学,而冈崎则已经在学习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科学论。

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文艺学”的说法,要到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文艺学”列入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的“基本课程”。这个设置的设想来自周扬,他当时是课程文学组的召集人,朱立元认为周扬可能参考了当年5月出版的一本《苏联文艺科学》,书中把俄语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解释为“关于文学的科学”,认为可以简译为“文艺科学”(Literature Science),英译为The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理论),日译则为“文艺学”。其实就是将俄语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学)参考日本译法译为文艺学。到此为止,都接上了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看到的论述,就是俄语的文学学太过拗口,翻译成了文艺学,增加的内容是参考了日本译法。但值得怀疑的一点是,周扬本人的俄语非常出色,也翻译过多部俄语作品,很难说他首先没有对苏联的文艺学理论有所了解,而且首先丁玲等人就已经从鲁迅处学习了“文学概论”的基础(比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或许他有意避开这个译法也是有可能。

现在需要考虑的另一个背景是,除了日本的文艺学是学自德国的文艺科学,苏联的文艺学理论也是学自德国的文艺科学。从资料考证,俄语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直接来自Literaturwissenschaft,两个词的构词方式完全一致。德语Literaturwissenschaft出现较早,17世纪的诗学研究中就在使用这个概念,后来到了19世纪,伴随着日耳曼语言学 and 民族主义的兴起,德国文学研究逐渐政治化,出现了“日耳曼学”学科,在1910年代初风靡于从维也纳到布拉佩斯的文坛。俄语中出现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是在1897年,翻译的是日耳曼学者恩斯特·艾尔斯特(Ernst Elster)的著作《文艺科学原理》(Prinzipi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而像冈崎那样频繁使用则是从1924-1925年的莫斯科形式主义圈子中。第一个主要使用者是帕维尔·尼科季奇·萨库林(П. Н. Сакулин),萨库林及其同仁在20年代末期发表了多篇讨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多采用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如萨库林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方法》(1925)、雅克霍夫的《科学批评的界限》(1925)、梅德韦杰夫的《文学研究的形式方法》(1928)等。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早期学术界向德国学习现代科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这些科学方法不久就随着苏联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而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随之兴起的是以“别车社”为主流、配合日丹诺夫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的也是这一类文论。至于改革开放后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则是后话。

「文艺学」译名小考

□丛子钰